

■ 戴健林 朱晓斌 著

写 作

心 理 学

XIE ZUO XIN LI XUE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写作

Writing

写景状物记叙文



写 作 心 理 学

戴健林 朱晓斌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写作心理学/戴健林, 朱晓斌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8

ISBN 7 - 5361 - 2907 - 6

I. 写… II. ①戴… ②朱… III. 写作－心理学 IV.
H05 -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6739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235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3 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前　　言

当我们在计算机上敲定最后一行文字，于身心俱疲的同时，亦感受到卸下重负的轻松。

摆在敬爱的读者面前的拙著，缘起于我们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引发的对写作心理问题的兴趣。1996年和1998年，我们有幸分别考入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师从我国著名心理学家莫雷教授和许尚侠教授（2000年，在许先生访美学术活动期间，张积家教授具体指导了朱晓斌的论文写作），攻读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我们各自对当时国内心理学家还少有人涉足的写作心理问题发生了浓厚兴趣，并最终决定把有关课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对于我们这一带有一定挑战性的选择，导师们在精神上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在具体的学术环节——包括论点与提纲的确立、实验方案的设计和最后文稿的修改等——给予了悉心指导。依托导师高深的学术造诣，再加上我们自身的不倦努力，便催生了两篇自认为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但仍带有不少遗憾的博士学位论文《写作构思过程的自我调控的研究》和《学生写作的认知负荷研究》。

上述两篇论文无疑为拙著的诞生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但作为一本企图表达体系化的理论构想的学术专著，与博士论文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专题研究有着实质性的不同，因此，本书从论文中直接移植过来的内容在整书中所占的比例很少，绝大部分是我们在完成学业以后对写作心理问题继续思考和研究的产物。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写作心理学这样一门远未定型、在我国可以说还带有一定的初拓性质的学科来说，拙著的这一体系框架在相当程度上只是表达了我们对这门学科的理解而已。毫无疑问，本书是

合作劳动的结晶，但这种合作又是建立在一定的分工基础上的：框架由戴健林大致拟定，前四章内容由戴健林撰写，后三章则由朱晓斌完成（朱晓斌现为杭州师范学院教科院教师），最后，由戴健林负责统稿。

拙著无疑蕴涵了许多师长、同学和朋友的智慧、劳动和激励。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导师之外，郑雪教授、刘鸣教授、申荷永教授、金志诚教授、陈雪枫副教授、王才康副教授等在我们学习与从事论文写作期间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在此，我们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同窗好友何先友、胡中锋、佐斌、张卫、王穗萍、冯夏婷、邢强、张金桥等在我们就学期间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了不小的帮助，结下了友情，尽管时光飞逝，但与他们在一起共同度过的这段日子无法忘怀，并将作为美好的记忆继续伴随着我们。此外，广州大学中文系纪德君博士、吴晟博士在掘著撰写过程中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意见，我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此，我们还要特别感激养育我们的父母。戴健林的母亲做了一辈子小学语文教师，朱晓斌的父亲则研究了一辈子小学语文教学，因此，我们很愿意相信我俩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对写作发生浓厚兴趣并把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恐怕与从小就自然接受的语文（当然包括写作）教养背景不无关系。谨以此书奉献给他们！

跨入写作心理研究领域，并深入地探讨一些基本问题时，我们发现面对的是积淀了丰厚底蕴的东西方文化智慧的巨大宝藏。在这一弥足珍贵但又充满迷惑的宝藏面前，我们所做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工作。限于学识，拙著辩而不明之处在所难免，因此，在书稿行将付梓之际，我们怀着坦然的心情，恭候着各方读者的批判声。

作 者
2003 年 7 月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写作与写作心理学 | (1) |
| 第一节 中国和西方写作思想源流 | (1) |
| 第二节 写作心理学研究概论 | (16) |
| 第三节 写作心理学的融入：写作理论的重构 | (41) |
| 第二章 写作构思 | (49) |
| 第一节 写作构思的实质 | (50) |
| 第二节 写作构思的类型 | (68) |
| 第三节 构思的方法 | (70) |
| 第三章 转译和修改 | (82) |
| 第一节 转译：从观念到文本 | (82) |
| 第二节 修改过程：评价和改正 | (92) |
| 第四章 写作过程中的自我调控 | (100) |
| 第一节 自我调控与写作 | (100) |
| 第二节 自我调控的写作实例：著名作家的自我调控 | (125) |
| 第三节 写作构思过程的自我调控：我们的研究 | (131) |
| 第五章 阅读与写作 | (151) |
| 第一节 阅读：语言理解 | (151) |
| 第二节 写作：语言生成 | (161) |
| 第三节 阅读与写作的关系 | (169) |
| 第四节 阅读对写作的迁移作用 | (175) |
| 第六章 写作心理能力的获得与发展 | (187) |
| 第一节 写作心理能力的构成和发展 | (187) |

| | | |
|------------|-------------------|-------|
| 第二节 | 写作心理能力的个体差异 | (203) |
| 第三节 | 写作思维的培养 | (215) |
| 第四节 | 写作心理障碍与矫正 | (229) |
| 第七章 | 写作教学的心理学问题 | (237) |
| 第一节 | 写作教学研究的演变 | (237) |
| 第二节 | 写作学习策略的分析与研究 | (252) |
| 第三节 | 有效的写作教学策略 | (257) |
| 第四节 | 几种有效的写作教学范例 | (264) |

第一章 写作与写作心理学

写作是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在这重意义上考察写作的远古渊源，人们多认为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和古希腊的泥板文书分别是中国和西方的最原始的写作文体。从甲骨卜辞和泥板文书距今的年代久远来看，写作对于人类来说无疑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实践活动。自此以后，写作作为人类生命存在的一种极其重要的精神活动形式，就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人类的生活，成了人们交流思想和感情、积累和传播文化知识的最主要手段。

正因为写作活动对于人类自身有着如此的重要性，也因为写作活动涉及语言学、修辞学、文体学、文艺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的广泛问题，因此，对写作活动规律的研究便成为了包涵非常丰富的学问。而写作心理研究，毫无疑问是写作研究这棵大树上的重要分枝，因为写作作为一种融合了作者思想、感情、学识和技巧等方面的复杂心智活动，要理解它的真实情况，离开对写作主体即作者自身在写作过程中的心理活动特点的把握，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我国，当前作为一门越来越显示出勃勃生机的写作学，若要突破传统的学科思维框架，寻求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得到写作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的支撑。当代西方写作理论和教学大量吸取认知心理学关于写作过程的研究成果即是一个明证。

第一节 中国和西方写作思想源流

在我国，对写作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周秦以降，古代

作家、学者关于写作的著述文本汗牛充栋，数量之多，世所罕见。古代学人关于写作之道的或者是片言只语的论述，或者是系统的理论建构，共同构筑了具有独立学术地位和传统的中国古代写作学。

在西方学术界，从古至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叫做“写作学”或意思相近的学科称呼。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写作学研究，而只是意味着他们拥有其自身的学术传统；实际上，西方学人关于写作所建构的知识，主要来自修辞学、文体学，尤其是前者。这里所说的修辞学，不是作为语言学分支学科、专门研究各种局部的语言修辞格的修辞学（就像现当代修辞学理论体系那样），也不是作为西方传播学、说服学意义上的专门研究讲演艺术规律的修辞学，而是作为与诗学并列的研究散文写作技术和艺术规律的修辞学。^①因此，在西方，特别是在英美国家的大学里，修辞学研究几乎就等同于写作学研究。

一、中国古代写作思想及其流变

中国历来号称“文章大国”。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学”和“文章”，也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写作思想。这些思想或学说大多蕴涵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然而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文论体大思精，自成一格，这不仅表现在它有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几乎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还表现在它拥有一整套特别的写作概念和术语，诸如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等。这些概念玄虚而晦涩，古人又常常不对它们的内涵作清晰、明确的界定，不同的论者对同一概念常常赋予不同的意义；即使是同一论者，在著作的不同地方使用同一术语

^① 参见：马正平编著，《高等写作学引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时，也往往赋予其不同的意义。因此，若生硬地用现代术语，尤其是西方写作文化背景下孕育的术语去套用，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误译”。

由于中国传统写作学在概念上以及理论体系上都独具特色，因此它与作为写作学科舶来品的西方意义上的修辞学、文体学大异其趣。

（一）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写作思想

在中国古代，人们常把写作活动称为“作文”、“属文”，而不称“写作”。这里的“文”，既包括今天意义上的所谓“文学”，也包括以实用为目的的“文章”。综观几千年中国文论史，“文”可以说是所有文字文本的总称。在中国古代第一本全面论述和确立文论框架的巨著《文心雕龙》里，“文”即是包笼所有言述的“大共名”。^①

中国是文章大国，也是文章古国。据史家考证，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单篇文章是殷代中期的甲骨卜辞。甲骨卜辞最初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考古学家一般认为，它们是商代迁殷到纣亡 273 年间的遗物。人们把同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这就成了甲骨卜辞。从社会功能、写作规范的角度来看，甲骨卜辞虽已具备应用文的雏形，但它们还处于前文章阶段，谈不上篇章规模（篇幅最长者也只有近两百字）。尽管如此，许多卜辞表现出了比较完整的篇章，颇具匠心的布局，对所发生的事象和当事人的感受也能进行流畅的表达，因此，我们仍可将它们看做是“一种很简单的散文”，“是中国文学最早创制”，“是一种简洁清晰的叙述文”。^②

以书本形式流传下来的最古文章应是记言的《尚书》和记

① 余虹. 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44

② 李镜池. 周易探源. 北京：中华书局，1978

事的《春秋》。^①《尚书》系儒家经典之一，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分别记述了上古唐尧、虞舜、夏禹时代、夏代、商代和西周的史事，保存了这一时期的重要史料。《尚书》除了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之外，还由于其古朴深奥的语言风格，在文学、语言学、写作学上也颇具研究价值。直到今天，我们还不时可以见到各个学科视角的研究专著问世。《春秋》是我国传世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亦是儒家经典之一，它记载自鲁国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 年）计 242 年的历史。《春秋》文辞简约，褒贬分明，义例森严，后世称为“春秋笔法”，曾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历史著作的写作。

战国时期，诸子文章勃兴。由于百家争鸣的热烈展开，私家著述的繁荣发展，词章写作的地位比以往有了显著的提高，它在“文”的概念中的比重有了较大分量。^②随着文章的勃兴，有关文章写作的理论也随之萌发。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对写作的本质、写作的价值、文章形式、文章的文与质、写作教学等方面作最初的思考。

有一个独特的景象，中国古人很早就给予写作以崇高的地位，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实际上，早在春秋时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即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① 张会恩，曾祥芹主编. 文章学教程.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347

② 参见：张少康，刘三富著.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3

据张少康、刘三富考证，“文”的概念的涵义在中国古代是非常复杂的。“文”的本义，按照《说文》所解，大致是指由线条交错而形成的一种带有修饰性的形式（“文，错画也，象交文。”），后引申为事物的一种美的形式。比较狭义的“文”，或者说常见的文化之“文”，在先秦时期一般被认为包含了学术和文章两个方面，但在战国中期之前，主要指学术，战国中期之后，文章的含量才大大提高。

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正因为在那个时代“立言”有如此高的地位，因此，就思想文化的创立和对后世的影响而言，春秋战国在中外许多论者看来都是堪与古希腊比肩而立的“轴心时代”，“立言”者灿若星辰，众多立言者的思想汇聚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要源头。就写作研究而言，《尚书》、《论语》、《墨子》、《庄子》、《荀子》中就已经出现了许多论述。例如，关于写作的本质，在先秦时代出现的一个堪称共识的著名命题是“诗言志”，这一命题的提出及广泛传播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为古代写作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石的，它开启了流传千年、迄今仍发挥着巨大影响的“文以载道”的写作观念的先河。有学者认为，“诗言志”这种观念最早是体现在《诗经》的作者关于作诗目的的叙述中的，但它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提出来，最早大约是《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到战国时代，这种说法就已经比较普遍了，在《庄子》、《荀子》等著作中都有表达这一意思的明确说法。^①

魏晋南北朝被认为是写作理论的成熟期。魏晋时期，涌现了系统论述写作之道的论著，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典论·论文》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文论著作，它在许多方面提出了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的卓越思想。例如，它从研究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特征关系出发，认为各作家对诸种文体的写作各有所长；与此同时，它亦指出了不同类型文体“本同而末异”的实质。它还特别强调了作家个性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当然，这篇论文尤为后世文人们所熟悉并津津乐道的是它论述文章的社会价值的下面这段话语：

^① 参见：张少康，刘三富著.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2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文赋》则被认为是我国第一篇系统论述文章写作方面（如定旨、构思、择体等问题）的著作。^① 陆机在书中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文章的写作过程，尤其集中讨论了以构思为主的创作过程。陆机着重强调了玄览^②、虚静的精神境界和知识学问的积累对作家构思的重要性（有关论述在“写作构思”一章中我们将有更详细的叙述）。同时，他还比较深入地讨论了各类文体的特征及其艺术风格。这些文论思想，对后来刘勰的“神思”论和文体论有重大影响。

齐梁时代，出现了我国古代一位非常卓越的文论家——刘勰。他撰作的《文心雕龙》，被公认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体系完整、组织严密、内容丰富且极具创见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同时也是文章学和美学巨著。鲁迅先生曾在《论诗题记》一文中把它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是东西方两部关于文艺和美学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作。

《文心雕龙》全书 50 篇，分上下两编、五个部分。上编 25 篇，是关于文章“纲领”之论述的；下编是论述文章的“毛目”的，加上总序《序志》，也是 25 篇。它的五个部分是：

- (1) “文之枢纽”；
- (2) “论文叙笔”；

^① 许嘉璐等主编. 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420

^② 玄览，语出《老子》：“涤除玄览，能无疵乎？”河上公注：“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即指排除一切感性经验、语言概念和欲望，让内心宁静地体验和直观万物。参见《辞海》1999 年版相关条目。

- (3) “剖情析采”；
- (4) 文学发展论、批评论、作家论；
- (5) “长怀序志”。^①

《文心雕龙》的出现，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写作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龙学”，国内外研究者众多，著述也很丰富。一般认为，《文心雕龙》研究的是广义的文章，不限于文学作品。在众多篇目中，刘勰都精要地指出了文章写作之道。例如，他一方面认为文无定法：“夫裁文匠笔，篇有大小；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创作韵文或散文还是有共同的规律可循的：“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

刘勰对文章写作（尤其是文学创作）之道的论述集中在第三部分“剖情析采”上。这一部分亦可以说是创作论。^②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魏晋以前，谈文学创作的只是片言只语。陆机的《文赋》开创了探讨文学创作的先河，但仅限于创作过程中艺术构思、修辞技巧等问题的论述，内容简略。刘勰在前人基础上，对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作了空前全面而系统的论述。他讨论的范畴包括了文学创作过程中涉及的几乎所有问题：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学创作的准备，文学构思，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风格，创作的继承和革新，命意谋篇，修辞，章句，声律，写作的方法和技巧，等等。对这些问题，刘勰都相当深刻地总结了前辈作家的创作经验，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① 参见：钟子翱，黄安桢. 刘勰论写作之道. 北京：长征出版社，1984. 5

② 参见：钟子翱，黄安桢. 刘勰论写作之道. 北京：长征出版社，1984. 11

有学者指出，《文心雕龙》在写作学史上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它最早建立了中国古代的写作学体系；其二，它较好地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对古代写作学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后人的创作和理论研究影响深远。^①

到了隋唐宋元时期，写作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以往相比，儒家之道在这一时期的写作理论中受到了特别的尊重，这主要体现在诸如“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之类的口号成为文人进行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时普遍遵循的原则。隋至唐初，隋文帝从儒家的政教观点出发，提倡质朴崇实，反对淫丽浮华，曾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②。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呼吁一切文章都要以“教化”为本，一切文章都要以实现“家复孝慈，人知礼义”为目的，甚至模糊和取消文学作品和一般文章的区别，否定文学的审美特性，揭起了全面复古的旗帜。大家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很多文人，从曹氏父子到嵇康、阮籍，再到陶渊明、谢灵运等，他们的诗文之所以传诵千古，在很大意义上正是由于创作思想突破儒家正统教义，融合道、释学说，自由抒发心灵，表达自己的感情，创造了后世公认的美学高峰。隋文帝、李谔等人过于强调文章的“道义”本原，在某种意义上是写作理论，尤其是文学理论的一种倒退。

由隋开启的这一脉写作思想到了唐宋文人那里，情况变得相当复杂。一方面，韩愈、欧阳修、王安石等散文大家都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奉者和鼓吹者，“翼道”、“卫道”是他们写作的重要

^① 参见：王凯符，张会恩主编. 中国古代写作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16

^② 见《隋书·李谔传》。转引自：张少康，刘三富著.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92

出发点。^①例如，韩愈明确提出对儒道要“明其道而道之”（《原道》），欧阳修倡导“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王安石则不仅赞成文以“明道”、“载道”，而且还认为宰相之尊，在推行新法时，把解说儒家“经义”的文章，作为科举考试主科。另一方面，唐宋散文家又表现出强烈的创新精神，反对浮华淫丽的文风，强调文章要言之有物，切实致用。例如，韩愈主张“陈言务去”、“辞必己出”，欧阳修倡言写作要“中于时弊，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王安石强调文章要“适用为本”、“有补于世”。

值得一提的是，在宋元时期，出现了十余本专门讨论文章理论的著作。如陈骙的《文则》，主要是讨论文章修辞的，是我国早期的修辞论著之一；陈绎曾的《文说》，主要是讨论文章作法的，涉及养气、抱题、明体、分间、立意、用事、造语、下字等八个方面；倪士毅的《作文要诀》，主要讲各种经义文章的写作，但其精神也适合于其他类型的文章；李涂的《文章精义》，主要是评点历代名家名文，给后学指点作文门径的，等等。

明、清时期，可谓我国古代写作理论的集成时期。这一时期，尽管统治集团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但在写作理论的发展上，却出现了许多新气象、新成果，并出版了大批写作学专著。

明、清两代，作家文人自觉结成派别进行诗文写作和理论研究的现象大量出现。明代的写作理论，主要体现在唐宋派、公安派以及李贽等人的著作中，而清代最有影响的写作理论则主要由桐城派、阳湖派以及黄宗羲、王夫之、袁枚等人提出。以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为首的唐宋派提倡为诗作文应当“自胸中

^① 参见：王凯符，张会恩主编，《中国古代写作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17